

DOI:10.13288/j.11-2166/r.2024.22.001

学术探讨

基于汉墓出土医学材料的经脉理论演变过程探析

孙晨耀¹, 张其成²✉

1. 北京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100091; 2. 北京中医药大学



[摘要] 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乙本, 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第二部分,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脉书·下经》《经脉》残篇以及髹漆经脉人像, 双包山汉墓出土的人体经脉漆木模型等出土医学材料进行梳理和分析, 从早期经脉文献缺失的臂厥阴脉并非手厥阴心包经的推断出发, 递进论证, 提出早期经脉文献的臂厥阴脉可能是被特意隐去, 现今通行的三阴三阳范式曾经历太阴、厥阴位置互换, 藏象与三阴三阳的配属衍生于经脉理论, 同时指出心包对应的实体脏器为心脏, 并简要分析了经脉理论的认识模型, 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经脉理论; 出土材料; 马王堆汉墓; 天回医简; 三阴三阳; 心包

经脉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经脉概念、经脉理论由来问题的深入研究, 既有助于临床、教学工作, 也可对相关领域的现代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而涉医材料的出土无疑为经脉理论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更多依据。出土材料包括文献资料和实物模型, 目前专论经脉的文献资料共6篇, 分别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1973年出土), 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第二部分(1983年出土),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脉书·下经》和《经脉》残篇(2012年出土)。本文所引用文本来源于《简帛医药文献校释》^[1]和《天回医简(下)》^[2], 并参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3]进行了校对。实物模型则包括双包山汉墓出土的人体经脉漆木模型(简称“双包山经脉人像”, 1995年出土)^[4],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髹漆经脉人像(简称“老官山经脉人像”, 2012年出土)^{[2]169}。在天回医简《脉书·下经》之前, 所有出土的经脉文献均记载了11条经脉, 缺失了“臂厥阴脉”。学界一般认为, 所缺失的这条经脉对应于《灵枢·经脉》的手厥阴心包经^[5]。本团队在对出土材料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 出土文献缺失的臂厥阴脉并非手厥阴心包经, 而所记录的臂太阴脉也非手太阴肺

经^[6]。围绕对上述问题的分析, 本文以汉墓出土医学材料为基础回溯经脉理论的演变过程, 以期为正正经体系的形成提出合理解释。

1 汉墓出土医学材料内容概述

张家山汉墓, 根据墓葬中的简牍及相关出土器物, 推测墓主人是名基层官吏, 下葬年代介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间^[7]。马王堆汉墓, 墓主人为西汉长沙王丞相利苍, 根据同时出土的纪年木牍, 推知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8]。老官山汉墓, 通过陪葬铜钱推测, 墓主人大概下葬于汉景帝执政时期(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9]。双包山汉墓, 墓主人生前应是有相当地位的贵族, 下葬时间在汉武帝之前, 介于汉文帝与汉景帝之间(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4]。因此, 若根据下葬时间由前到后为这4座汉墓排序, 大致应为: 张家山汉墓→马王堆汉墓→老官山汉墓→双包山汉墓。

《脉书》第二部分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内容大体相同, 因而也被称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 《足臂十一脉灸经》《脉书·下经》和《经脉》残篇则是相对独立的3篇。《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丙本只记载了11条经脉, 6条足脉以“钜阳、少阳、阳明、泰阴、厥阴、少阴”命名, 2条臂脉以“臂钜阴、臂少阴”命名, 另外3条臂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ZDA331)

✉ 通讯作者: zhangqicheng96@163.com

则以“肩、耳、齿”命名。描述方向主要为末梢至中央（泰阴脉、肩脉除外），足脉之末梢是至踝为止，臂脉之末梢是至手为止，其中4条经脉与脏器相属：泰阴（胃）、少阴（肾）、臂钜阴（心）、臂少阴（心）。条文排列顺序为阳脉在前，阴脉在后。经脉病候分“是动”“所产”。

《足臂十一脉灸经》也只记载了11条经脉，6条足脉在“太阳、少阳、阳明、少阴、泰阴、厥阴”前均冠以“足”名，5条臂脉亦在“泰阴、少阴、太阳、少阳、阳明”前均冠以“臂”名，呈现了一致的命名规律。描述方向均为末梢至中央，足脉之末梢是至踝为止（泰阴、厥阴至足大指），臂脉之末梢是至手为止，其中1条经脉与脏器相属：臂泰阴（心）。条文排列顺序为足脉在前，臂脉在后。经脉病候以“其病”概之。

《脉书·下经》有11条经脉的命名规律与《足臂十一脉灸经》相似，但多出了“心主之脉”。描述方向均为末梢至中央，且其末均达至手足，其中4条经脉与脏器相属：足泰阴（肠胃）、臂大阴（心）、臂少阴（心）、心主之脉（心）。条文排列顺序为足在臂前，阳在阴前，阴阳各自之中，太、少在前，阳明、厥阴在后，心主之脉居于末。经脉病候亦以“其病”概之。正如黄龙祥指出，《脉书·下经》“十二脉”基础底本为《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条文中存在两个底本相融合的痕迹^[10]，比如，经脉命名、经脉病候与《足臂十一脉灸经》相同，经脉与脏器相属则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相同。

《经脉》残篇阙文过多，难以分析体例。可以推知的是，其学术体系与其余5篇出土文献以及《灵枢·经脉》存在重合，比如该篇中臂少阳脉的所主病，同样指向“中指不用”，可解读的大阳脉、少阳脉、阳明脉循行，也与《灵枢·经脉》高度相似^[11]。

老官山经脉人像包括22条红色粗线、29条白色细线、119个清晰可见的腧穴点及多处阴刻的铭文（如五脏俞），其中红色粗线与体表血管走行相似，白色细线则与现今通行的《灵枢·经脉》十二正经体系高度相似^[12]。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人体经脉漆木模型共有19条纵向上下循行的主脉，其中位于身体正中线的有1条，循行路线与现今通行的督脉基本相同，位于身体两侧左右对称分布的共18条，循行路线与《灵枢·经脉》的手三阴脉、手三阳脉、足三阳脉基本一致，唯不见足三阴脉^[4]。

2 臂厥阴脉对应经脉及缺失原因分析

2.1 缺失的臂厥阴脉并非手厥阴心包经

自马王堆帛书出土以来，《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较《灵枢·经脉》缺失的“臂厥阴脉”一直是学界的热议问题。关于所缺经脉是否为《灵枢·经脉》中的手厥阴心包经，我们认为，不能单纯以经脉名称作为判断的唯一依据，还需要综合具体条文进行分析。

《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描述臂泰阴脉的循行为“循筋上廉，以湊臑内，出腋内廉，之心”^{[1]48}；《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描述臂钜阴脉的循行为“在于手掌中，出臂内阴两骨之间，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内阴，入心中”^{[1]59}。两处的描述比较接近，均走行于前臂内侧，循两骨之间向上，最终入心，相较而言，《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细节更丰富，可将其视为对《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补充与完善。如果《阴阳十一脉灸经》的“筋”指“屈肌总腱鞘”，那么整体与《灵枢·经脉》手厥阴心包经在手臂的循行“循臑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极接近，唯方向相反。

经脉病候也是如此。《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臂泰阴脉的病候为“其病，心痛，心烦而噫”^{[1]48}；《阴阳十一脉灸经》中，臂钜阴脉的病候为“是动则病：心滂滂如痛，缺盆痛，甚则交两手而战，此为臂厥，是臂钜阴脉主治，其所产病：胸痛，臑痛，心痛，四末痛，瘕，为五病”^{[1]59}，也多与“心”相关。唯一与手太阴肺经相通的“臂厥”，也非肺经所独有。

至于《脉书·下经》多出的“心主之脉”，其循行路线为“心主之脉（脉），骹（繫）掌中，上出辟（臂）中，出肘（肘）中，走夜（腋）下，□入匈（胸），循匈（胸）里，上加大阴，上循□龙（咙），下骹（繫）心”^{[2]47}，与同篇“臂大阴脉”的循行路线极为相似：“骹（繫）手掌中，循辟（臂）内阴两骨之间，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辟（臂）内阴，至□（腋），入心。”^{[2]46} [注：异体字、假借字随文注出，外加（）；脱字用“□”表示。下同。]正如黄龙祥指出，天回医简《脉书·下经》存在《阴阳十一脉灸经》丙本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两个底本相融合的痕迹，虽然记载了12条经脉，但很可能只是以“心主之脉”为名，将“臂钜（泰、大）阴脉”多

记录了1次^[10]。

当然，手臂内侧的“筋”有若干条，如拇长屈肌腱、指浅屈肌腱、指深屈肌腱、屈肌总腱鞘等。早期经脉文献较为简略，各段中的“筋”具体指代何处，臂脉具体如何走行，存在解读空间。但是，无论从循行还是病候来看，臂钜（泰）阴脉均与手厥阴心包经更为接近，而与手太阴肺经存在较大差异，早期经脉文献中的臂钜（泰）阴脉并非《灵枢·经脉》之手太阴肺经，早期经脉文献所缺经脉也并非手厥阴心包经，更可能是手太阴肺经，本团队在《早期经脉演变浅析》^[6]一文中对此已有所论证。

2.2 缺失的臂厥阴脉可能是被特意隐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早期经脉文献缺失了“臂厥阴脉”，但是在老官山经脉人像、双包山经脉人像上均完整刻画了臂三阴脉。老官山经脉人像（详见附图1，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中红色线疑表示血脉，白色线疑表示经脉（气脉），可以看到后世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已经被清晰标出。不止如此，《灵枢·经脉》记载的十二经脉，该人像均有刻画，包括足厥阴肝经、足太阴脾经于内踝上交，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在头面部的循行等细节。缺点在于，虽然线条整体呈现双侧对称，但是刻画略显随意，更像是“过程性的草稿”，而非“成果性的定稿”。

双包山经脉人像（详见附图2，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的躯干及上肢手绘图不仅同时刻画了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整体线条也较为工整，双侧经脉呈现高度对称。事实上，双包山经脉人像已十分接近传世文献对于经脉体系的记述，唯独缺失足三阴经。考虑到同时期的经脉文献、实物模型对足三阴经已有体现，双包山经脉人像中缺失足三阴经，应不属于认知盲区，更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省略或隐去。如有研究者^[13-14]经考证认为，足三阴脉所主症状多致死，因此在陪葬品中略去足三阴脉，有为死者祈福之意。

由于经脉人像完整刻画出了臂三阴脉，“其时只有两条臂阴脉”的观点很难得到支持。《脉书·下经》同出土于老官山汉墓，但未体现手太阴肺经，经脉实物模型却体现了手太阴肺经，这可能是经脉学说过渡时期两种经脉体系并存的特殊现象。与其认为存在另一种经脉体系，不如选择更简单的解释，即臂三阴脉在《脉书·下经》乃至《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等早期经脉文献成

书时期已总结完成，但是出于某种考虑，臂厥阴脉（大致对应今手太阴肺经）被特意隐去，正如足三阴经在双包山经脉人像中被特意隐去。至于原因，则要从“灸”字论起。

有研究^[15]认为，《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脉书·上下经》乃至《黄帝内经》中的经脉相关内容以及《难经》，均源自扁鹊学派的经脉诊疗体系，亦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的“医经”一派。从早期经脉文献标题中的“灸经”可知，《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主要用于指导灸法实践，治疗经脉主病时，直接灸相应经脉的特定穴位即可^[16]。然而，早期灸法往往直接用艾炷烧灼皮肉，且多取原穴^[17]，而肺经的特殊之处在于，扁鹊学派脉诊所“独取寸口”的部位恰恰在肺经的原穴（太渊穴）附近，倘若此处被烧灼溃烂留下瘢痕，势必会影响医者凭脉，同时此处的表浅血脉也更容易被艾炷灼伤。因此，扁鹊学派在刊行基于经脉诊疗体系的“灸经”时，出于安全考量将肺经隐去是有可能的。因为早期文献制作、保存不易，《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的文本谱系能同时在三座墓葬中得以发现，仅从概率角度分析，便可推知该文本在当时流传甚广，这种情况下，扁鹊学派将肺经隐去，不失为一种保护非医学专业读者的审慎选择。

3 太阴、厥阴位置互换对后世三阴三阳范式的影响

早在《阴阳十一脉灸经》成书时期，6条足经便以“钜阳、少阳、阳明、泰阴、厥阴、少阴”冠名，且与《灵枢·经脉》的六条足经相对应，说明三阴三阳范式此时已经确立，只是具体名称与今不同。那么，前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创制了三阴三阳范式，其中的6个范畴又是依据何种逻辑与经脉相配属，这在经脉研究乃至整个中医理论研究领域都是必须厘清的重要议题。同时也事关一个具体问题：为何在早期经脉文献中手太阴近似配属心包经，在《灵枢·经脉》中却转而配属肺经。

三阴三阳范式的特殊之处在于，符合直觉的阴阳系统都是“2”的幂运算，即太极（0次幂）、阴阳（1次幂）、二阴二阳（2次幂）、八卦（3次幂）等，而三阴三阳范式却是“2×3”。换言之，三阴三阳范式并不直接来源于阴阳演绎，从三阴三阳范式包含的“太、少”之名可以推知，三阴三阳范式是由二阴二阳范式拓展而成。因此，探析三阴三阳范式可以从二阴二阳范式入手，而二阴二阳范式，

则可以用明代易学家来知德所绘的来氏太极图^[18]体现。我们把来氏太极图的左阴右阳,改为了更符合当代习惯的左阳右阴,并在中间涂色,将冲气加以突出,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在“气的圆运动”中,少阳和太阴都处于“阳气总量少”的状态,太阳和少阴都处于“阳气总量多”的状态^[19]。依此逻辑,可以将“少阳-太阴”“太阳-少阴”两两配对,而在《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足六经在人体的位置为:阳明在前、少阳在中、太阳在后;厥阴在前、太阴在中、少阴在后。不难发现,“少阳-太阴”“太阳-少阴”正是处于交错对应的状态,分别居于足经的中、后位,而“阳明-厥阴”则是直接对应,居于足六经的最前位,其位置游离于传统的二阴二阳之外,正符合《灵枢·阴阳系日月》中“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两阴交尽,故曰厥阴”的论述^[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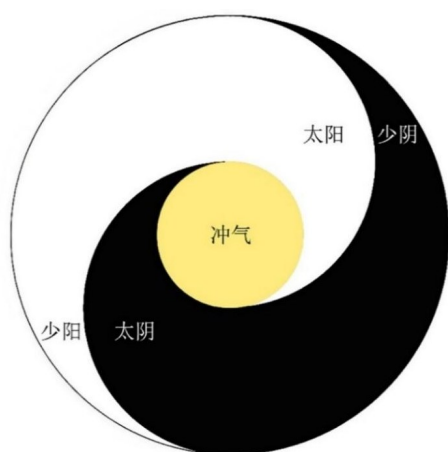


图1 二阴二阳合冲气示意图(据来氏太极图^[18]改)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wo yin and two yang merging and charging qi (according to Lai's Taiji diagram body)

由此可见,最初的三阴三阳范式极有可能是在二阴二阳范式之上直接添加“阳明-厥阴”范畴而成。当然,“阳明-厥阴”并不是空泛的指代符号,也有其哲学意蕴,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言:“阳明何谓也……两阳合明也……微阴(厥阴)何也……两阴交尽也”,“阳明-厥阴”可用以指代“比太阳更阳、比太阴更阴”的状态。不只足脉,《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臂脉的命名实际上也遵循这一规律:双臂自然垂放在身体两侧,则手臂外侧呈阳面,内侧呈阴面,此时臂脉的三阴三阳排列顺序,也为阳明在前、太阳在后、少

阳在中,厥阴在前(原文未载)、太阴在中、少阴在后。

综上,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三阴三阳范式之所以出现,应是因为所发现的经脉结构超出了二阴二阳系统的容量,因此需要在原有范式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具体的配属方法则是从后向前,依次将外侧、内侧经脉配属于“太阳-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厥阴”。至于为何居于后的经脉配属太阳而非居于前的经脉配属太阳,可能与《素问·金匮真言论篇》“背为阳,腹为阴”的认识有关。

在上述位置关系的基础上,前人进一步考虑到,由于足厥阴脉和足太阴脉在内踝上交汇,两者的位置互换为“太阴在前、厥阴在中”,并且在躯干部位继续呈现这样的位置关系(见图2),因此调整了足脉的位置关系,最终厘定为“太阴在前、厥阴在中、少阴在后”。为了保持足臂一致,臂脉的“太阴、厥阴”也被调换了顺序,原先以厥阴为名的前部经脉,改为以太阴为名。自此,足臂阴经的命名改为遵循“太阴在前、厥阴在中、少阴在后”原则,而足臂阳经的命名依然遵循“阳明在前、太阳在后、少阳在中”原则不变,最终便呈现为后世通行的经脉表里关系(太阳-少阴、少阳-厥阴、太阴-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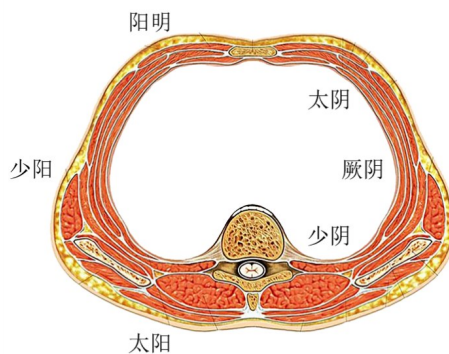


图2 足六经位置关系横切面示意图

Figure 2 Cross-sectional diagram of the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ix channels of the foot

《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将图2中身体前侧的朝向视作南方,在此基础上,按照太极图“左升右降复归中”的原则在横切面依次连接六经,可以形成“1 太阳→2 阳明→3 少阳→4 太阴→5 少阴→6 厥阴”的传变顺序,恰与《素问·热论篇》《伤寒论》中的六经传变规律相合,该规律亦可佐证刘渡舟教授在《伤寒论临证指要》中的论述^[21]。

4 经脉理论对藏象与三阴三阳配属关系的影响

经脉理论渐进成熟,不仅需要厘定三阴三阳的位置关系,也需要明确经脉与脏腑的联系。《灵枢·经脉》中十二经脉的命名规则为“藏象+手足+三阴三阳”,内容主体则由循行、病候两部分构成,沿着上述思路,我们进一步还原经脉、藏象、三阴三阳建立配属的具体过程。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心出臂少阴,肺出臂太阴,肾出髀少阴,胃出足太阴”^{[2] 57},言“胃出足太阴”而非“脾出足太阴”,是因为“五行-五脏”配属曾经历过“以胃代脾”的过渡阶段^[19];同时,此处的“臂太阴”与肺相联系,说明臂太阴脉和臂厥阴脉很可能在本篇撰写时已完成了名称互换,或者本篇正体现了“支持二者名称互换”的学术思潮。该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脉、藏象、三阴三阳之间的配属逻辑^[22],即先是经脉与三阴三阳配属,再是经脉与藏象配属,最终形成藏象与三阴三阳的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现今所熟悉的“肺、脾-太阴”“大肠、胃-阳明”“心、肾-少阴”“小肠、膀胱-太阳”“心包、肝-厥阴”“三焦、胆-少阳”对应关系,乃至脏腑之间的表里关系,有很大可能是经脉理论的衍生。

作为经脉学说、藏象学说的交叉点,该对应关系有极高的理论自洽性,以此为基础整合各领域(如诊断学、病机学、内科学、运气学)散在的经验,中医理论整体呈现出“大一统”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三阴三阳范式逐渐取代了二阴二阳范式。最初的二阴二阳范式,可以视作五行范式的“异名同质”概念,相关论述诸如《素问·金匱真言论篇》曰:“阳中之阳,心也……阳中之阴,肺也……阴中之阴,肾也……阴中之阳,肝也……阴中之至阴,脾也”,《灵枢·阴阳系日月》曰:“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阴中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尽管对“五行-五脏”阴阳属性的记述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可以简化为:少阳-木-肝、太阳-火-心、少阴-金-肺、太阴-水-肾、至阴-土-脾。其弊端在于,只可用于归纳“脏”,难以用于归纳“腑”。

在三阴三阳范式出现后,经脉理论渐进成熟,阴阳、经脉、脏腑各得其位,最终在观念层面扭转了二阴二阳范式对于“五行-五脏”阴阳属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更为完备的理论模型和

解释体系。

5 心包与实体脏器对应关系的探讨

除上文探讨的数个经脉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外,首见于《脉书·下经》的心主(心包)究竟为何脏亦需要进行分析。事实上,中医之脏既为气化之脏,亦为形器之脏,对此,本团队在既往研究^[23]中已有所论证。根据出土文献推知,“心包”极有可能就是心脏,因为《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起于掌中的“臂钜(泰)阴脉”,最终分别是“入心中”和“之心”,《脉书·下经》的“心主之脉”,最终也明确是“下髀(繫)心”^[24]。但为何该经脉最终以“心主(心包)”而非“心”为名,可能存在两种原因:1)经脉理论的整理者拘泥于“脏腑-经脉”——配对的规则秩序,无法认同有两条经脉同时连属于同一脏,故将其中一条经脉配属的脏器名称作差异化处理;2)经脉理论的整理者在认识手少阴心经和手厥阴心包经时,切实发现了两者的循行规律存在微妙差异,后者的循行连属于心脏的偏外部,故将其配属之脏称为“心主(心包)”,前者的循行连属于心脏的偏内部,故将其配属之脏直接以“心”相称,但是后人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只能机械地传抄文本,延致此疑难问题。

即使不考虑文献依据,仅通过临床观察,也可以得到“手厥阴心包经和手少阴心经同时连属于心”的认识:当心痛发作时,手厥阴心包经和手少阴心经所主之处,都是疼痛可能累及的部位^[25],在手厥阴心包经和手少阴心经取穴,也都可以很快缓解心痛。在发现心痛同时引动两条经脉,此两条经脉又都能缓解心痛之后,先民自然会将这两条经脉与心脏的联系体现在医学理论中。该认知可能贯穿了经脉理论的构建过程,甚至起到了核心作用。

6 结语

本文从早期经脉文献缺失的臂厥阴脉并非手厥阴心包经的判断出发,回溯了经脉理论演变过程中的数个问题,也管窥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体演变。对“三阴三阳范式的形成过程”“经脉、藏象、三阴三阳的配属过程”“心包对应何脏”等问题进行了阐发,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榷疑作用。继续向下挖掘,则要面对两个本始问题:1)前人如何发现体表的经脉现象及其与脏腑的联系;2)中医学的“经脉”概念本质是什么。在后续研究中,我们会围绕上述问题进一步阐发。

参考文献

- [1]周祖亮,方懿林. 简帛医药文献校释[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 [2]天回医简整理组. 天回医简(下)[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 [3]裘锡圭.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4]马继兴. 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J]. 文物,1996,42(4):55-65,98.
- [5]蒲永乐,蔡鹤云. 手厥阴心包经理论发展探析[J]. 亚太传统医药, 2023, 19(3): 215-219.
- [6]赵希睿,熊益亮,王群,等. 早期经脉演变浅析[J]. 中医杂志,2018,59(16):1354-1356.
- [7]陈耀钧,阎频. 江陵张家山汉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1985,26(12):1124-1129.
- [8]晓菡.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J]. 文物,1974,20(9):40-44.
- [9]金陵,曾帆,薄咏,等. 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整理简报[J]. 文物,2017,63(12): 48-57.
- [10]黄龙祥. 老官山出土汉简脉书简解读[J]. 中国针灸, 2018,38(1):97-108.
- [11]顾漫,周琦,柳长华,等. 天回医简《经脉》残篇与《灵枢·经脉》的渊源[J]. 中国针灸, 2019,39(10):1117-1123.
- [12]黄龙祥. 老官山出土西汉针灸木人考[J]. 中华医史杂志,2017,47(3):131-144.
- [13]何志国. 西汉人体经脉漆雕再考[J]. 四川文物, 2000,17(6): 6-11.
- [14]路崇薪. 绵阳双包山汉墓经脉漆人研究[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21.
- [15]柳长华,顾漫,周琦,等. 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J]. 文物,2017,63(12):58-69.
- [16]王丽,赵京生.《足臂十一脉灸经》“灸某脉”探赜[J]. 中国针灸,2020,40(11):1251-1254.
- [17]窦材. 扁鹊心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2.
- [18]来知德. 易经集注[M]. 上海:上海书店,1988:54.
- [19]孙晨耀,张其成. 中医五行思维:溯源与扬弃[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1):5390-5403.
- [20]张维波,李宏彦,刘兵.《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概念的空间解析[J]. 中医杂志,2019,60(6):455-460.
- [21]刘渡舟. 伤寒论临证指要[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3:26.
- [22]顾漫. 天回医简所见阴脉与五脏的配属[J]. 中国针灸,2022,42(9):1053-1058.
- [23]孙晨耀,张其成. 由“五行-五脏”配属演变论及“肝脾”位置[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2):6987-6991.
- [24]洪晓帆,陈思婷,李红霞.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早期演化考[J]. 中国针灸,2021,41(3):349-353.
- [25]葛均波,徐永健. 内科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236.

Exploration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annels Theory Based on Medical Materials Excavated from Han Tombs

SUN Chenyao¹, ZHANG Qicheng²

1.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rough combing and analysing the Silk Texts of *Hand-Foot-11-Channels by Moxibustion* (《足臂十一脉灸经》) and *Yin-Yang-11-Channels by Moxibustion* (A and B) (《阴阳十一脉灸经》) unearthed from the Mawangdui Han Tomb,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of Vessels* (《脉书》) unearthed from the Zhangjiashan Han Tomb, *The Vessels Book-Second Part* (《脉书·下经》) in Tianhui medical bamboo slips and the fragmentary text of *the Channels* (《经脉》) and the painted channel portrait unearthed from the Laoguanshan Han Tomb, and the lacquered wooden human body's model of channels unearthed from the Shuangbaoshan Han Tomb,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annels starts from the arm *jueyin* channel which was missing in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channels, instead of the the hand *jueyin* pericardium channel, and then argues progressive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rm *jueyin* channel in the early meridian literature may have been purposely omitted, that the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paradigms that prevails nowadays has experienced the interchange of the positions of *taiyin* and *jueyin*, and that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visceral manifestation and the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are derived from the channels theory, and that the pericardium corresponds to the solid organ of the heart, and that the cognitive model of the channels theory has been briefly analys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channels theory; excavated material; Mawangdui Han Tomb; Tianhui medical bamboo slips; three *yin* and three *yang* paradigms; pericardium

(收稿日期: 2024-06-12; 修回日期: 2024-09-14)

[编辑: 侯建春]